

主 编◎喻洪麟 奚正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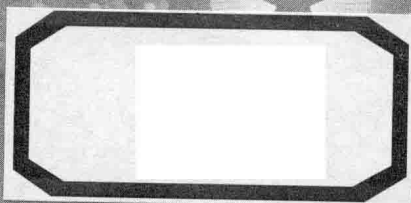
——新编高等学校党课培训教程

踏上崇高的 信仰之路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主 编◎喻洪麟 奚正新
副主编◎曹 瑜 李盛姝



踏上崇高的 信仰之路

——
新编高等学校党课培训教程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踏上崇高的信仰之路：新编高等学校党课培训教程 /
喻洪麟，奚正新主编.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643-5782-5

I. ①踏… II. ①喻… ②奚… III. ①中国共产党—
基本知识—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908 号

踏上崇高的信仰之路
——新编高等学校党课培训教程

主编

喻洪麟
奚正新

责任编辑 郭发仔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印张 12.75 字数 221千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1月第1次

印刷 成都中铁二局永经堂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5643-5782-5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21楼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定价 28.00元

课件咨询电话：028-87600533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前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需要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越渴求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强则国家强，人才兴则民族兴，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要，对于把我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确保我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对广大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训，我们编写了这本《踏上崇高的信仰之路——新编高等学校党课培训教程》。

本书主要针对高等学校的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编写。本书立足于我国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结合高等学校的实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奋斗历程与历史经验、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作风与纪律、当代大学生的信仰选择以及入党的条件和程序等，并附有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2017）、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入党常用文书及范文、入党誓词和党的基本知识测试模拟题，每章还附有知识链接和思考题。全书框架结构严谨，逻辑体系完整，突出了党性、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是一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高校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党课培训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读物。

本书由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的喻洪麟、奚正新担任主编，曹瑜、李盛姝担任副主编。具体分工如下：奚正新负责前言、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附录的编写和全书的统稿；曹瑜负责第三章和第六章的编写；李盛姝负责第二章、第五章和第八章的编写。本书大纲由奚正新拟出，经编写组讨论后修改确定，全书由喻洪麟、奚正新负责审稿和定稿。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7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与经验	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1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30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35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35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44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51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51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53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55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63
第一节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63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	70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72
第四节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78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	84
第一节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	8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	89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与纪律	96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展	96
第二节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101
第三节 党的纪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108
第七章 当代大学生的信仰选择	116
第一节 “中国梦”与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责任	116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入党的时代意义	118
第三节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当代大学生正确的信仰选择	120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和程序	123
第一节 申请入党的基本条件	123
第二节 发展党员的程序	127
第三节 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33
附录	140
附录1 中国共产党章程	140
附录2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2017年)	162
附录3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67
附录4 入党常用文书及范文	174
附录5 入党誓词	185
附录6 党的基本知识测试模拟题(一)	186
附录7 党的基本知识测试模拟题(二)	191
参考文献	196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与经验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又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国的又一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他们各自割据一方，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背景下，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分裂和动乱之中。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且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使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

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由于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它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1919年上半年，“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的权益，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一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延伸到工人。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并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讨论，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和优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首先在上海成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于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等。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并要求党在斗争中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①

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犹如一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8。

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成长、壮大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惨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

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国民革命军于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阳；随后攻打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国民革命军随即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线发动猛烈进攻，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

江、南昌；12月中旬进占福州。与此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至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在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先后公开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二）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进攻南昌。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经瑞金、寻邬（今寻乌）进入广东。9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遭到失败。余下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转战闽南、赣西、粤北、湘南，最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所以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八七会议”。迫于白色恐怖，会议仅开了一天，共有三项议程：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

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式。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肩负起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实行武装斗争，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广州、海陆丰、湘东、湘南、黄安等地的工农群众在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先后遭到失败。1928年4月，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红色政权和革命力量得到加强。

但是，这小块地区的红色政权仍处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仍不断地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剿”。在这样的形势下，“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革命能不能在农村根据地坚持并发展下去，成了党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①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②毛泽东在文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红色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54。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56。

色政权的经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同年1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红四军同其他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并且在赣南、闽西地区打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同一时期，赣东北、洪湖、湘赣边、鄂豫皖以及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都在不断粉碎敌军进攻中站住了脚，获得了初步发展。这样，“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论证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已经通过实践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它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相当一些人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要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观点，即“城市中心论”。为此，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力量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击败，短期内无法在城市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来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的敌人，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直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变成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它反映

了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正是循着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走向胜利的。

（四）“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①，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错误。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②。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27。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45。

“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的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了复兴局面，但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五）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变本加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决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

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夏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华北进而灭亡整个中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面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制定出了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①。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417。